

语言学名家译丛

论语言、思维和现实

——沃尔夫文集

本杰明·李·沃尔夫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语 言 学 名 家 译 丛

论语言、思维 and 现实

——沃尔夫文集

本杰明·李·沃尔夫 著

姚小平

主编

约翰·B. 卡罗尔

编辑

高一虹 等

翻译

Masterpieces in Linguistics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语言、思维和现实: 沃尔夫文集/ (美) 本杰明·李·沃尔夫著; 高一虹等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语言学名家译丛)

书名原文: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I. 论 ... II. ①沃 ... ②高 ... III. ①沃尔夫—文集
②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0796 号

Twenty fourth printing, 1998

Copyright © 1956 by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版权通过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帮助获得。

语言学名家译丛

沃尔夫文集

高一虹 等译

责任编辑: 陈 凯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岳阳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32 开 印张: 11.375 字数: 280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5355-3503-8/G·3498

定 价: 20.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丛》总序

西方语言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过去国内已译出不少，尤以商务印书馆的一批最具规模，传布最广。如20世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萨丕尔的《语言论》、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18、19世纪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洪堡特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无一不是世所公认的经典作品。名作要著的翻译，是认识和研究西方语言学史的一项基础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已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有待进行的工作仍然很多。例如17世纪中叶法国人阿尔诺和朗斯洛合撰的《普遍唯理语法》，19世纪末叶德国人保罗的《语言史原理》，20世纪丹麦人叶斯泊森的《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美国人沃尔夫的文集《论语言、思维与现实》等等，都是当译而未译之作。即如洪堡特，如萨丕尔，如布龙菲尔德，虽都已有汉译名著行世，其各时期的重要论文也还需要译解。

本《译丛》系为填补西方语言学名家作品汉译的空白而设。选录宗旨大抵有四：

以文集为主，兼纳单本著作；

以尚无汉译的作品为主，兼顾名家的重新阐释；

以已有定论的经典著作为主，兼采当代有影响的



作品；

以体现人文哲理为主，兼容分析技艺。

一个新的世纪、新的千年行将到来。而新时代的认识和创为，将取决于对旧时代遗产的继承和扬弃。愿有更多的同志参与这项清理西方语言文化遗产的工作。

姚小平

1999年岁末于北外

译 序

—

沃尔夫的名字，总是与“沃尔夫假说”或“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联系在一起。这一假说的“学名”叫做“语言决定论”、“语言相对论”。决定论即语言决定思维；相对论即思维相对于语言而存在，语言不同的人，思维亦不同。大凡对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文化感兴趣的人，很少有不知道这一理论的。“假说”看起来有悖常理，加上沃尔夫是学化学出身且终生做防火保险员，虽曾师从萨丕尔但从未获取任何语言学学位学衔，所以他的思想似带上了某种怪诞的、江湖的色彩。西方的社会和人文学科中，不少教师乐于在讲课时谈论沃尔夫，有些还津津乐道于“空汽油桶”引起火灾的趣闻（见《习惯性思维、行为与语言的关系》）。这一趣闻广为流传，乃至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沃尔夫的思想不过是偶然地生发于一只空汽油桶，且仅仅存放于这空桶之中。他的文字著述反倒于多数人遥远而陌生。而对于广大中国读者来说，即便诚心诚意地想走近沃尔夫，也难以找到途径。沃尔夫的思想难免被极端化、简单化、刻板印象化，它像是一颗口香糖，被许多人惬意地玩于舌尖，随之唾于身后。然而按照沃尔夫本人的说法，他的思想（于西方人）是一粒“苦药丸”（见下文），在呲牙咧嘴捶胸顿足之后，尚需耐着性子细细品味、咀嚼和消化。今天，我们十分高兴有机会将沃尔夫的原著译成汉语，将其精神营



养奉献给中国读者。

沃尔夫 44 岁便英年早逝，生前没有机会将自己的思想系统地梳理，写成专著。在他身后，约翰·卡罗尔将其部分文章集结成《论语言、思维与现实》，由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于 1956 年出版。文集中共包括写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40 年代初的文章 18 篇，有些当时已经发表了，有些尚未发表。这本文集可说是沃尔夫公开发表的惟一主要著作，读者可以从中比较系统地了解作者的主要思想，其材料基础和理论概括，其结论和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便可以独立于以往的种种解释和评论，与作者更直接地对话。

西方学者对于沃尔夫思想的阐释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50 年代，沃尔夫假说引起了许多人的兴奋和兴趣。在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及其实证主义方法论影响下，人们试图设计出精确的实验，以检验该假说的“真”或“伪”。文集编撰者卡罗尔在序言中对有关研究方向的预见和建议以及为沃尔夫所做的辩护，便明显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学者对沃尔夫假说的研究基本上沿着实证主义的道路发展，在颜色词与颜色认知、虚拟式与“反事实假设”、数字系统与数字认知、词汇与物体分类等方面已经进行过一系列实验、讨论和争鸣。实证研究有了一些结果，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一，不同研究的结果之间相互矛盾，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其二，即便实验本身有了明确结论，也难以证明或推翻“沃尔夫假说”之宏观理论。其三，有关研究涉及到文化优劣的比较，引起民族情绪矛盾。有人甚至提出，任何语言相对论的研究都可能会引起文化之间的优劣比较，从而在本来就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制造更多的麻烦。因此，对语言相对论的实证检验走入低谷。90 年代以后，对于沃尔夫假说的讨论热度又有回升。有人试图将实证主义发挥至极端，设计出更加严密的科学实验。亦有人反思以往的研究思路，指出“语



言相对论”不过是沃尔夫丰富思想的一部分；他的整体思想体系应归纳为一个“沃尔夫理论结”。还有一些人对“沃尔夫假说”的表述方式本身提出质疑和追问，认为这未必是沃尔夫本意。于是，出现了回到文本、阅读原著的呼吁，沃尔夫已发表的著述和未发表的手稿、信件，成为一些学者的关注焦点。（本人曾就西方有关研究做过综述，文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2期）

我国对于萨丕尔、沃尔夫思想的介绍始于50年代末，是民族语言学界从苏联学者那里进口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这种介绍从一开始就裹挟于批判之中，或者说只有批判，并没有相对完整、客观的介绍。语言相对论被贴上“反动的种族主义”、“唯心主义”的标签。经过文革的沉默，在80年代改革开放、重新引进外来思想的形势下，沃尔夫假说再次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民族语言学者试图借鉴这一理论，分析和解释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材料；在中国本土新兴的“中国文化语言学”，视萨丕尔—沃尔夫的美洲语言人文主义为主要理论源泉之一，以支持中国语言与文化独特性的观点；由外语教学界引进的“跨文化交际学”，将沃尔夫所述语言与思维差异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前提，同时又当做必须逾越的障碍，其目的是促进文化之间的沟通 and 理解。出于不同的目的和视角，人们对沃尔夫思想的阐释和评价并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已经出现的批评和争鸣，大多有关语言决定论、语言相对论之“对”与“错”，以及语言相对论极端性之谬误。不过，这些议论的文献基础，大多是对沃尔夫思想的简单介绍或概括性评论（参见本文集译者之一吕琚的硕士论文《语言相对论在中国》，北京大学英语系，2000年）。在借鉴思想资源以建构理论大厦或指导具体实践时，理应对资源本身有一透彻了解，并在此基础之上评估其价值。而这一切，都需以阅读核心著作为基础。



二

如果细读文集，读者便会注意到，沃尔夫的思想中有一些看似矛盾的方面，难以简单地纳入刻板印象中的“语言相对论”框架，并由此接受“对”与“错”的评判。以下举两例。

1. 知识与价值，“求真”与“求善”

沃尔夫声称语言学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将它与数学、物理学相比较。在《作为精确科学的语言学》一文中，他将语言的结构规律用数学公式表示，论述其精确性：

语言学公式虽然不是数学公式，但仍然十分精确。需要记住的是，以上结构式与英语（或其他一些语言）中处理词义的一些语法型式相比，就像一个简单的加法和与一整页微积分相比。……

作者对语言学特性的描述，是以自然科学为参照的。例如他这样描述语言学的“实验性”：

语言学也是一门实验性科学。它的数据来自控制条件下长期的观察。如果这些条件被系统地改变，就会产生确定的不同结果。实验是在一整套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与物理学、化学实验一样。通常情况下，语言学实验不需要机械设备，而是运用和发展技术。实验并不一定意味着量化。语言学中很少会用到测量、称重、读指针等方法，因为在型式的王国中，量和数的作用微乎其微。型式的王国中没有变量，而是从一种结构到另一种结构的突变。数学科学要求精确的测量，而语言学所要求的是精确的“型式化”（patternment）——一种关系的精确性，不考虑维度的关系的精确性。

在沃尔夫看来，语言学甚至比数学更高级，在众多精确学科



中处于统领地位：

哲学和数学分析家们对目前的状况帮助不大。他们对语言学本身知之甚少，却在此条件下探究更高领域的语言符号体系。该领域内的大多数现代学者不幸缺少这种基础训练。对语言朴素的基本原理毫无正确认识而试图去研究高级数学公式的语言意义，这无疑会招致失败。……总有一天，语言学会坐在法官的席位上，而其他学科则将其研究结果拿到它的法庭上来，等待它裁决这些结果究竟意味着什么。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语言学就会像其他精确科学一样，拥有自己的宏伟而装备精良的实验室。（《作为精确科学的语言学》）

由此，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沃尔夫俨然是一个冷面的自然科学家，执著于精确、客观、“硬”的事实和规律。对于他来说，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求真，即探寻有关事实和规律的知识。

但另一方面，沃尔夫又随处展露他对印第安土著语言的激情，以及对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鞭挞。他甚至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些“原始语言”与欧洲“文明语言”的优劣评判：

欧洲语言及思维习惯处于显赫地位，也是经济和历史原因所致。其文化已经达到现代文明水平的少数几种语言，意欲扩张至整个地球，使成百上千奇异多彩的语言种类遭受灭顶之灾。虽然这一企图是事实，但依此声称这些欧洲语言代表了某种优越性是毫无根据的。只需对无文字体系的语言，尤其是美洲的语言进行初步的科学研究，就会发现情况恰恰相反，这些语言中有许多比我们的语言精确、细致得多的关系系统。同许多美洲语言相比，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中对概念的形式系统化显得低级、拙劣。举个例子，当我们说“我看见它是红色的”（I see that it is red），和“我发现它是新的”



(I see that it is new) 时，为什么不采用另一种方式，像霍皮人那样来表达两个句子中感觉渠道（视觉，seeing）的关系，使其出现在意识层面？我们把两种很不相同的关系混在一起，变成由“that”表达的某种模糊联系，而霍皮语则表明，在第一种情况下，“seeing”在意识中呈现了关于“红色的”感知；在第二种情况下，“seeing”呈现的是没有说明的一些迹象，从中推衍出了“新”的性质。如果把句子改成“我听说它是红色的”（I hear that it is red）或者“我听说它是新的”（I hear that it is new），我们欧洲人还会死抱着蹩脚的“that”不放，而霍皮人则用另一种关联方式，不去区分“红的”和“新的”，因为两句在意识中呈现的是一种语言报道，既非感知，亦非推理证据。在此，比起自鸣得意的英语，霍皮语是不是显示出更高的思维层次，对情境更富有理性的分析？结论当然是肯定的。在这方面以及许多其他方面，英语较之于霍皮语就像是笨拙的短棒之于轻捷的短剑。（《原始社群思维的语言学考察》）

沃尔夫并未专门研究过汉语，但他在题为《思维：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短文中援引了赵元任以说明汉语的独特性，并由此明确指出，有必要认真研究包括汉语及其思维方式在内的他民族语言和思维方式：

汉语中没有表示“word”的词。最贴近的是“字”，翻译过来是“word”，但实际意义是“音节”或“音节成分”。许多这样的成分从不单独出现，而只能与几个其他成分结合而构成词，就像“pyrometer”（高温计）中的“pyr-”（高温）那样。词汇单位意义上的词可以以一个或两个音节的形式出现，不过汉语的书写传统是将每一个音节都分开的，因而词与词之间的界限也



就相当模糊。这一观点是由耶鲁大学的赵元任博士在题为《汉语中词的概念》的论文中提出的（美国语言学学会会议，罗德岛州普洛维顿斯，1940年12月30日）。我们对于汉语语法性质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赵博士等人已经推翻了汉语是单音节语言的论点。在同一个会议上，耶鲁大学的G.A. 肯尼迪博士在《汉语的复杂定语表达方式》一文中指出，汉语中没有关系从句，相应的逻辑关系是由另一种秩序系统支配的。如果将表达这一逻辑的“的”翻译成“-ish”，那么“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杰克造的房子》）在汉语中就相当于“This is Jack-ish build-ish house; this is Jack-ish build-ish house-ish in-ish lie-ish malt”（这是杰克的建造的房子；这是杰克的建造的房子的面里的放着的麦芽），等等。

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理解其他国家兄弟的认知和情感，全世界兄弟团结合作的理想就不会实现。西方人已经通过美学和文学，对东方人的情感有了一些了解，但这还远不足以在思想之鸿沟上架起桥梁。真正东方形式的科学思想以及对自然的分析，其逻辑思维基础究竟是怎样的类型，我们仍知之甚微。这就需要对当地语言的逻辑进行语言学研究，而且必须意识到，这些逻辑与我们自己的思维习惯有着同等的科学效力。（引自编者前言）

在写给印度某通神学刊物的另一篇文章中，沃尔夫又借用印度哲学的概念明确指出，语言的理解有助于跨文化交流的实现，有助于民族之间平等的兄弟之情：

这种对语言的理解，将促使我们达到人类兄弟情谊的一个高级阶段。这是因为，对于多种语言的科学的了解（并不一定学会讲这些语言，分析其结构即可），乃



是人类兄弟情谊之一课。这种情谊是人类的普遍准则——作为“意之子”（Sons of Manas）的同胞之情。它使我们超越自身的种种界限——文化、民族、被贴上“种族”标签的生理特征，等等。置身于千姿百态的语言系统当中，欣赏它们的规律、和谐、系统之美，体味它们各自的微妙以及对现实分析之透辟，我们会发现：人人平等。那些物质文化、野蛮、文明、伦理道德等等的进化阶段，与这一事实毫不相干。对一个文明的欧洲人来说，这种平等非常不可思议，令人震惊，简直就是一粒苦药丸！（《语言、心理与现实》）

由此，我们又看到沃尔夫炽热的一面。

沃尔夫究竟是一个客观、精确的形式主义语言学家、自然科学家乃至“科学主义者”，还是一个具有博爱之心和“终极关怀”的文化人类学家、人文社会学者或“人文主义者”？“语言相对论原则”是知识的创造，还是价值的倡导？是求真，还是求善？

2. 相对主义与普遍主义

沃尔夫素来以相对主义思想著称，他的名字在人们心目中与语言相对论有着对应联系，就像爱因斯坦与其相对论一样。尽管沃尔夫本人从未明确地提出“语言决定论”，但对于“语言相对论原则”，他的确有清楚的论述：

由此即引出了我所说的“语言相对论原则”（linguistic relativity principle）。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就是使用明显不同的语法的人，会因其使用的语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行为，对相似的外在观察行为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因此，作为观察者他们是不对等的，也势必会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观。（我在四月份的文章中，已经对这一观点做了更为正式的阐述。）这种世界观是朴素的、未经概括的。人们可以对孕育了这种世界观的基本语法



型式进行更高层面的特征概括，从而由每一种朴素的世界观发展出一种清晰的科学世界观。由此看来，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是根据西方印欧语言的基本语法特征概括而成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语法导致了（caused）科学的产生，它只是影响了（colored）科学。（《作为精确科学的语言学》）

这一相对主义思想，贯穿沃尔夫的所有研究。但同样贯穿其所有研究的，还有看似与相对主义对立的、有关语言和思维的普遍主义思想。

在对霍皮语的研究中，沃尔夫描述了两种特殊的动词形式——“瞬止体”和“链续体”，认为这两种相互关联和对照的语法范畴精确地表述了某种物理现象，因而具有普遍性：

我们已经看到霍皮语如何细致地描绘出可被称为“原始物理学”的特定领域，看到它如何根据形变过程的基本类型，将所有振动现象加以分类，其分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真正的科学精确性。霍皮语对自然界某个领域的分析可以自由延伸，总体上与真正的物理学并行不悖。这种延伸非常适合用来分析完全属于现代科学技术世界的大量现象——机器和机械装置的运动、波的过程和振动、电力现象、化学现象。（《霍皮语动词的瞬止体与链续体》）

同样，沃尔夫认为，在霍皮语中发现的“隐型”具有普遍的语法学和心理学意义，不失为人类共同的思维方式之基础。

可以看出，在霍皮语这样的语言中，语法形式的意义是隐型和显型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显型单独作用的结果。这个概念当然也适用于霍皮语以外的许多其他语言。到目前为止，语言学家的研究几乎完全局限于显型；对隐型的研究开拓了更注重心理因素的语言学发展



时期。(《关于霍皮语言学的讨论》)

沃尔夫认为，有必要进行“世界范围的语言调查”，以找到人类共同的语言机制。他为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编制了一份调查提纲。“毫无疑问，他想使自己提出的这个提纲成为一个标准框架，以指导这种大范围语言调查中具体语言的材料采集。”（编者按，《语言系统轮廓之构想》）。在《语法范畴》一文中，沃尔夫特别讨论了“隐型”、“显型”等语法范畴的普遍意义。他在文章开篇说：

人们似乎有一种自然倾向，喜欢使用传统语法的术语，如动词、名词、形容词、被动语态等，来描述印欧语系以外的语言。这种倾向极有可能引起误解。我们十分需要采用某种方法来定义这些术语，以便我们能够利用它们带来的便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它们以科学的、一致的方式应用于外语。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采用全球视角来观察语言现象，重新审视在语言中发现的各类语法范畴，在某种新的意义上建构和修订概念，增加必要的术语。这些对外语的观察方式同样也适用于英语。(《语法范畴》)

在一份研究基金申请中，沃尔夫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他的普遍主义思想。他在详细论述了对墨西哥语言学某些特殊现象的研究计划之后，这样描述研究的最终目标：

接下来的工作，是用这些原则找出所有言语行为的原始基础。可以说，这是为一门新的科学打下基础。虽然这一切都是将来的事，但我觉得它们近在眼前。更远一些的将来，我们也许可以应用这门新的科学，重建原本可能存在的人类共同语，或者完善一种较为理想的、以声音的原始心理意义为基础的自然语言，也许它将成为未来的共同语，同化我们目前所有的语言；或者换一种方



式表述：所有语言都将还原为这种共同语。（引自编者前言）

阅读这位相对论倡导者的文集时，读者不仅会想到萨丕尔、洪堡特，而且很容易联想起索绪尔、乔姆斯基、荣格、弗洛伊德。我们可能感觉，与其说这是关于印第安语言及思维特性的描写，不如说这是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甚或普通心理学著作、哲学著作。沃尔夫是否有两副面孔——一副是相对主义的，关注特性的，另一副是普遍主义的，关注共性的？它们是否反映了沃尔夫思想中的矛盾，或是构成了具有内在逻辑的悖论？沃尔夫是在指明通天塔之建造被废止的事实，还是试图重建通天塔？他奉献给我们的智慧是解构的还是建构的？他比我们更多成熟，还是更多童真？

沃尔夫的思想中还有不少迷，等待读者去玩味和解读。

三

文集的翻译是在多位学生、朋友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译者除我本人之外还有吕珺、李育超、周雷、董锡燕、刘鸿勇、申小龙、李朝、沈英英、王志欣。原著的序、编者前言以及正文的1、2、3、5、17、18篇是我译的，其他每篇的译者名字注于文后。全书由我统一校订。一些中国读者不常见的人物、概念等，在文中加有译注。专有名词及术语的译法，在书后附有译词对照表。在全书校订过程中，清华大学外语系程慕胜教授花了许多时间帮忙解决疑难问题，北京大学外语学院赵振江教授帮助翻译了书中的西班牙语部分。对文集的翻译给予直接帮助的其他专家学者还包括：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张保胜教授、刘意青教授、沈弘教授、王文融教授、Nathan Fairey 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研究员赵世开先生。我代表所有译者深深地感谢他们。我们还要



特别感谢本套丛书的主编姚小平先生以及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同志，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做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与此同时，我本人将为全书译文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和不妥之处负责。恳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给予批评指正。

记得马丁·布伯说过，翻译是译者与作者的“我一你”对话，是跨越时空、跨越历史的精神“相遇”。在不可不谓艰苦的翻译和校订过程中，我真切地体验了许多——轻松的愉悦、智性的乐趣、豁然启迪、深深的感动。为此鲜活的精神相遇，我最要感谢的，便是本书的作者。

高一虹

2000年11月29日